

作為歷史學家的徐宗澤

徐文華*

徐宗澤在其從事的眾多文化研究工作中，對公教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尤值一提的是，當今學者在研究明清耶穌會士文化活動及近代天主教傳播情況時，都會引用徐宗澤所編撰的兩部重要天主教歷史著作，即《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這兩本書是徐宗澤借助於去歐洲留學接受神學哲學訓練的機會及其長期從事徐家匯藏書樓管理工作的機會所編輯的，這使他的著作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同時也奠定了他成為中國近代較早開始研究天主教史的教會歷史學家。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

該書由徐宗澤編著，於1938年底由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其內容在《聖教雜誌》第二十五、二十六卷中已刊登過。1990年10月，復旦大學、上海書店為保存史料搶救文獻，決定從民國時期出版的約十萬種圖書中選擇數千種輯為《民國叢書》。徐宗澤的兩部教會史著作《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都列入其中。《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是一本通論性質的宗教史書籍，全書共分十一章：〈開封猶太教〉、〈唐景教碑出土史略〉、〈唐景教論〉、〈元代之聶斯脫里異教〉、〈羅馬教廷與蒙古通使史略〉、〈明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中國天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雍乾嘉道時之天主教〉、〈中國聖教史——自鴉片戰爭至今日〉、〈中國聖教掌故拾零〉。從其章目我們可以瞭解徐宗澤十分注重對中國天主教早期歷史的研究。

在閱讀該書時，我們會發現徐宗澤治學嚴謹，博採眾長，注重史料收集的全面和準確。如在講開封猶太教時，他引用的相關資料有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陳垣先生的〈開封一賜樂業教

考〉；在講唐景教碑及唐景教史時，引用夏鳴雷司鐸的《西安教碑》（法文版）、馮承鈞的〈景教碑〉。其它一些主要參考書有：王治心編的《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德禮賢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蕭若瑟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高龍馨的《江南傳教史》；此外，作者還引用一些報刊上的資料如《聖教雜誌》、《彙報》、《聖心報》、《禹貢雜誌》等。其實，徐宗澤在書中還引用了很多法文資料作佐證，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該書史料運用的豐富和翔實也得到學術界研究人士的認可，成為天主教史研究的必看書目。著名史家王治心在其通史著作《中國基督教史綱》一書中，對中國天主教研究也有相當的篇幅，其第十二章〈禮儀問題的爭端及影響〉後半錄自徐宗澤之《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九章。⁽¹⁾早在20世紀初期，中國天主教會就興起了一股注重中國文化建設的潮流⁽²⁾，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充實和豐富了徐宗澤的著述。

該書除資料運用、敘述方法上的特點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便是他的教會敘述史觀。對於猶太教在中國的興衰，徐宗澤認為：

嗚呼猶太教寺猶太教碑，至今不過為考古家

* 徐文華，武漢市第十二中學歷史教師，上海大學歷史學碩士，師從顧衛民教授。

之憑弔而已，猶太人亦不自知其教義。蓋一賜樂業教已失其宗教存在之性質。吾曰是不足為惜，蓋猶太人所等待之默西亞既來斯世，而立定新教矣；即羅馬公教。(3)

對於唐景教、元聶斯脫里教，徐宗澤從基督教正統教義角度出發認為它們是異教——

吾謂景教不必紀念；蓋景教謂耶穌有二性二位：天主性，天主位，人性人位，聖母非天主之母親，此異端道理也。此異端寄生於中國，不即消滅，為聖教之傳揚不特是一阻礙，且為信德之一致，是一擾亂，景教之絕跡於中國，實天主教主智之安排也。(4)

對於教案的發生原因，徐宗澤認為：

原教案之發生，由於雙方之誤會，彼此之隔膜，愚民無知，妄聽謠言，而禍患起矣。(5)
故教案者實為民教之不幸事件，而吾天主教固清潔自守，而不知已被人嫁禍而蒙其害矣。(6)

這些教會立場的言論出現在一本歷史著作裡，在當時的非教會學者看來，是不可理解而且會認為是非常錯誤的，必然會引起當時學者的反感。1939年9月的《圖書季刊》就有一篇很不客氣的評論，認為：

其叙天主教之傳播，則口口聲聲，曰天主教主智之安排，曰聖徒在天禱祝之功效，純屬宣傳之口吻，叙述史事者所忌也。結論數面，完全宣傳，更可不必。(7)

這些表明了徐宗澤堅持一種教會史觀，是站在教會立場來進行敘述的，與當時興起的一些關注教會史研究的學者，如陳垣、張星娘、馮承鈞、向達、方豪等的學術研究路向不同，作為徐家匯耶穌會培養起來的一代天主教智識分子，徐宗澤身上體現了較強

的護教色彩，其思想比較保守，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與當代社會學界間進行溝通的阻礙。

對於明清耶穌會士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所形成的輝煌歷史，徐宗澤是非常贊賞的。對於利瑪竇、徐光啟的文化傳教政策，徐宗澤認為，學問的作用“在人們的悟司上曉示以真理，於是欲司動而欲之；故其力量，和緩而固定。”“是從本性的學問，引人歸到超性的學問。”(8)徐宗澤更多是從傳教策略方面來贊賞明清耶穌會士們的“文化傳教政策”，至於利瑪竇與徐光啟為加強中西文化間的融會所做的努力，並沒有展開深入的討論。在分析中西交通史上著名的“禮儀之爭”時，談到耶穌會士們關於中國傳統的敬孔祭祖之事看法的分歧，徐宗澤認為，利瑪竇之所以允許中國教徒們參加祭祖，同意考生考中後入孔廟行禮，“原利子之所以許可者，亦不過從權，暫時之處置而已。”(9)而事實上利瑪竇所實行的文化傳教政策，是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理解，是真正適合當時中國實情的傳教政策，與當時多明我會傳教士反對祭祖敬孔的做法不同，利瑪竇努力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到一種調和，而這種方法也絕非權宜之計。(10)作為教會史研究者，徐宗澤看到了利瑪竇所創傳教方法的成功之處；但當時教廷關於“禮儀之爭”尚未解禁，徐宗澤祇能站在教會的立場上對這一事件做出解釋，這反映了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和宗教徒的矛盾。

《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

作為耶穌會士，徐宗澤對於明清耶穌會士著作的收集工作非常積極——

或為中文著作，或為當年之木版本，或為手抄本，或為自世界各大圖書館影得之珍本，如土山灣排印本徐氏《庖言》，及交商務印書館印行之《名理探》十卷本，皆為徐宗澤所得珍本。(11)

而《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是徐宗澤於1940年為紀念耶穌會創立四百年而編著的，1949年由中華

書局出版。該書共十卷，卷一為緒言，對“明末耶穌會士輸入之科學”、“西士所著書之分類”、“羅明堅之天主聖教實錄”、“利瑪竇之天學實義”、“西士所著書影響於中國整個學術”、“西士輸入科學方法之影響”、“西士所著之宗教書”、“西士與華士著譯書籍”、“西士所編譯書之文理”、“華儒潤色西士之書籍”等十個問題進行了簡要論述。作者認為，明清時期從西方傳入的很多關於天文學、地輿學、火器學等方面的書籍，對中國整個學術都有影響，使人們開始注重以科學之方法研究學問，所討論的問題皆為切實有用之學。關於書籍的翻譯，作者講述了西士與華士在艱苦的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翻譯西書的過程，以及中國智識分子潤色外來書籍努力使譯文符合原著精神的情況。

從第二卷至第八卷，作者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法，分為聖書、真教辯護、神哲學、教史、曆算、科學、格言等七類；在這七卷中作者摘錄了各類書的序言，便於讀者瞭解所錄書的寫作宗旨、內容簡介。這七類書中關於“聖書”、“真教辯護”這二類書的序言內容比較多，其它五類相對而言較少；在“科學類”中錄有艾儒略、楊廷筠、東海許胥臣為《西學凡》所作的一些言論，這些都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作者收錄的這七類書的序言成為該書的主體。

第九卷為譯著者傳略，收錄了從明清開始約七十位來華的外國譯者。這些略傳包括作者的中外文字、生卒年月、國籍、在華經歷、所譯著書籍，以及這些書籍的出版時間、地點等，內容較為詳細。這些是徐宗澤從費賴之司鐸所著之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一書之中摘編各譯著者之傳略而成。⁽¹²⁾ 近代研究明清耶穌會士資料的豐富在客觀上也便利了徐宗澤的編著工作。

第十卷為徐匯、巴黎、梵蒂岡圖書館書目，它們是：

一、《徐匯書樓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共四百零五種。徐家匯

藏書樓的藏書是江南耶穌會重建之後，會士們刻意收集的，較多的是重刻本和照片翻拍本。二、《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收錄較多，為七百三十一種。巴黎耶穌會省是本會重建後，負責向中國傳教的會省，許多中國文獻被集中到那裡，因此還有不少中文著作，特別是一些早期的中文手稿和刻本，在明清時就被作為檔案送到總會。三、《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收錄羅馬教廷圖書館的中文著作。收錄時刪除了重複書目，留下的是重要的文獻和手稿書目，共一百六十九種。⁽¹³⁾

這些是徐宗澤神父利用在巴黎和羅馬攻讀神學博士的機會，又利用他當任徐家匯藏書樓館長的條件統計的三種書目。這些書目雖然比較簡單，卻是徐宗澤成為較早關注梵蒂岡漢籍文獻的中國學者之一，具有較重要的開創意義。徐宗澤於1927年4月25日致陳垣函稱：

北平圖書館自袁先生回來後，亦曾寄下華諦岡圖書館書目，惟查各書，敝處〔指徐家匯藏書樓〕都有矣。⁽¹⁴⁾

對巴黎國立圖書館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中國文獻重視比較早的有王重民⁽¹⁵⁾、向達⁽¹⁶⁾、方豪等，他們都利用去梵蒂岡圖書館的機會，收集與中國歷史相關的文獻。在國家動盪不安而很少人注重典籍收藏整理的年代，像徐宗澤這樣的天主教智識分子在收集明清耶穌會譯著資料方面所做的這些努力，極大地便利了後人研究中國基督教傳播歷史及東西文化交流史。

對於這本書，有學者從著譯圖書的學科類型來分析西學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情況，如1996年6月《四川圖書館學報》上發表的〈從《明清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看中西學術交流〉一文；還有學者從對明清西學譯著文獻的翻譯特色角度來研究該書，如《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5月刊登的〈論明清之際耶穌會

士譯著文獻的翻譯特色》一文，作者宋巧燕得出這樣的一些結論：

譯著活動主要由傳教士和我國學者合作完成；翻譯以“達意”為主要原則；文獻編譯融合中西，中方學者取捨標準視其能否經世致用；譯筆風格多樣，不乏佳作。

還有學者這樣分析該書——

這是唯一一本中國天主教文獻目錄學專著。(17)

以上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通過分析該書透視明清時期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情況，這一點可能是徐宗澤在編輯該書時也沒有想到的。

徐光啟研究

徐光啟⁽¹⁸⁾是晚明著名科學家，他與李之藻、楊廷筠被稱為晚明中國天主教的“三柱石”。徐光啟讚同和參與了利瑪竇等人提倡的學術傳教思想，他們以和平、平等的傳教方式開創了天主教在華傳播史上的一個高峰。明清耶穌會士不論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還是在天主教的傳播方式上，都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後人研究的熱點。徐氏家族自徐光啟開始成為上海望族，其後人多從事朝廷文職工作；到了徐光啟第十一世孫徐允希即徐宗澤的叔叔始為神父，徐光啟第十二世孫徐宗澤也為神父，徐宗澤胞侄徐懋禧亦為神父。也許是因為受家族先人的信教傳統影響，也許是因為作為一個天主教智識分子的責任要求，近代徐氏後人都非常關注徐光啟的資料收集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

據歷史學家方豪回憶——

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問漁神父杖編印徐文定公集四卷；三十四年(1908)，文定公十一世孫允希編增訂徐文定公集五卷，次年鉛印問世。

民國二十二年為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紀念，徐宗澤神父又增訂一次。五十一年，值文定公誕生四百週年，徐神父胞侄懋禧在臺北影印者即此本。

民國二十八年，徐神父又作增訂，曾將校樣寄昆明託余複校，余告以明崇禎十一年(1638)陳子龍刊行明經世文編內有徐文定公集，還有遺文三十三篇，可採用。但此一增訂本，迄未發行。(19)

徐宗澤對於徐光啟及李之藻等明清耶穌會士資料的收集真可謂盡心盡力，不厭其煩，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徐宗澤與馬相伯、陳垣、方豪等的大量來往書信中體味之。為了盡量減少徐光啟文集編輯的錯誤，一方面近代學人努力尋找資料的原本，如1862年是徐光啟誕生四百週年紀念，當時王重民正在為上海中華書局重新編校《徐光啟集》，希望恢復到明本的文字之舊，所依據的材料中就有徐允希、徐宗澤所據家藏祖本之明鈔本《徐文定公奏疏》三冊，及徐宗澤在巴黎圖書館攝影的明刻本《徐氏庖言》。(20)另一方面，學界人士間書信往來頻繁，互通各人收集資料的情況，以求資料收集得更準確更全面，徐宗澤寄給陳垣的書信中曾談到：

先生今春寄下之續訂徐文定公集目錄上，有卷三、五、六中數篇，為敝處所未有。如蒙託人抄錄惠下，不勝感激。澤刻在續印文定公集，如蒙公准加上，尤為欣幸。

徐文定公著有《毛詩六帖》，聞羅振玉先生抄有是書，不知仗先生鼎力能設法覓到否？(21)

總體來看，徐宗澤關於徐光啟的編纂工作有：《增訂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彙編》(土山灣印書館1934年4月)、《影印徐氏庖言》；未刊稿有：《再增訂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傳》。除了對徐光啟的思想進行整理外，徐宗澤還利用他作為《聖教雜誌》主編的機會組織一些紀念活動來擴大徐光啟的影響，喚起人們對這位明末偉大的教會人士的研究。

1933年是徐光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徐宗澤在《聖教雜誌》上發表社論〈開教肇慶建堂三百五十週奉教閣老去世三百週〉，在1933年第2期上該雜誌又刊登了陸公徵祥提議徐文定公列品之請求書——

（……）受到國內外同道同志的贊許，同時南京教區主教惠濟良也積極支持，議決由《聖教雜誌》社出一《徐上海專刊》編印《文定公徐上海傳略》及出版由巴黎國立圖書館影印以歸之《徐氏庖言》，而陸徵祥提議將增訂之《徐文定集》增補重印中箱本。宗教典禮方面，議決於徐光啟逝世日開一追禱大會，東請中西政商學界參與典禮，惠濟良主教發出中法文請柬。當日社會各界名流都有到場，上海各大雜誌報刊對此事也都有報導，南京中國天文學會所出之《宇宙》雜誌，及鍾山書局出版的《國風半月刊》，天津《北辰雜誌》均出專號，徐家匯師中學《我們的教育》社亦特出《徐文定公三百週年紀念論文》。（22）

徐宗澤編著的《徐文定公逝世三百週年紀念文彙編》（聖教雜誌社，1934）一書，包括了眾多社會名流發表的文章，其中既有著名的教會人士張星曜、黃節、馬相伯、徐景賢、張百祿等，也有竺可楨、向達、潘光旦等教外人士參加。這次紀念會可謂意義重大，對於天主教會來說，徐光啟是中國天主教史上貢獻卓越的教士，陸徵祥等人向羅馬教廷提出的關於給徐光啟列品的請求，顯示了近代中國教士們希望通過弘揚歷史來提高中國天主教信徒在羅馬教會中的地位，是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是20世紀初中國天主教本土化運動開展所取得成果的一個表現。

徐宗澤認為徐光啟一生有三事業：“篤信公教，渡進科學，熱心救國。”對於徐光啟是否真正篤信公教這一點，一直以來“某些中國近現代學者對他皈依天主教的真誠性表示懷疑，國際上也有一些類似的看法”（23）。更何況20世紀初的一些學者們呢？黃節在〈徐光啟傳〉中曾這樣寫道：

蓋陽尊其教，而陰取其象數之學，以為己用。彼教士之傳其藝學，如是其慎，光啟匪奉教，曷蕲其傳，則其對於教宗所以信服而圖益者可見已。（24）

對此，徐宗澤作為編者認為：“此說未免誣光啟，失實。”徐宗澤是站在教會立場來看待徐光啟的宗教信仰的，認為他是虔誠的天主教信徒，所以不容許別人對徐光啟信仰有任何懷疑。對於徐光啟的“渡進科學，熱心救國”，這兩點是得到教內外人士一致贊同的，在中國民族危機加深，智識分子積極尋找各種救國理論的時代更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吾人際此東北淪亡，國難日亟之秋，紀念此一有明一代之大人物，為中國近代文化上之先知者，應如何激勵奮發，勉承先賢禦侮抗暴，科學救國之英武精神，以發揚光大之耶。（25）

我國雖由光啟於三百年前提倡科學，但吾人試觀今日之成績，則實堪痛心。（……）至於應用方面，非但無重大之發明，抑且少精確之製造，自國防利器，以至日常用品，無不仰給外國輸入，而一般社會缺乏科學常識，尤非二十世紀所應有之現象。（26）

借古人的精神來激勵近代國民的科學精神、愛國熱情，這一目的在近代學者中也有很多回應者，如梁啟超、胡適等。對於非天主教信徒來說，徐宗澤曾談到——

當今教外學者中，有不少喜歡研究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傳入之科學，因而同情於公教者，不在少數。（27）

這說明中國天主教智識分子們也希望努力擴大公教在社會學者中的影響，來提高公教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

徐宗澤與徐家匯藏書樓

徐家匯藏書樓是耶穌會於1847年在徐家匯營建的一座藏書樓，分為上下兩層，上層主要貯藏希臘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名貴西文書籍八萬冊。據1993年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西文珍本書目》的介紹，上海圖書館目前收藏的西文珍本書籍，相當一部分來自徐家匯天主教藏書樓。下層專藏中文書籍，有徐宗澤神父從各地搜集而來的省府廳縣誌，有各省名貴碑帖等十二萬冊，誌書二千一百餘種以及各種古幣等文物。據徐宗澤神父遺著《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明清間教會書目》，可知該館藏有明清以來耶穌會士和中國教徒所撰的教理和教史著作數百種，其中有《天主實義》、《畸人十篇》、《三山論學記》、《聖經直解》、《主經體味》、《彌撒經典》、《主制群徵》、《主教緣起》、《超性學要》、《名理探》、《徐氏庖言》等名著。⁽²⁸⁾

徐宗澤自從留學歸國回到徐家匯以後，便一直擔任徐家匯藏書樓館長一職直到逝世。徐宗澤在擔任館長期間整理出〈徐匯書樓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共四百零五種，收錄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一書後面。徐宗澤所列書目中很多珍貴的書籍在新中國建立前被國民黨帶到了臺灣，“攜至臺灣的天主教圖書，是以‘徐宗澤目錄’所收為基礎，配了藏書樓一些方誌和其他善本而成。”⁽²⁹⁾ 隨着人們對教會史研究的日益重視，徐家匯藏書樓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開始被重視起來，而徐宗澤在擔任館長期間所整理出的書目為人們瞭解20世紀中之前藏書樓的藏書情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徐宗澤擔任館長期間，一直希望把藏書樓對外開放，實行現代化圖書館的管理方式，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文化機構吸引更多學者對於公教文化研究的興趣，但這一建議一直沒有得到教會的採納。教外人士想進去查資料都是被禁止的，但徐宗澤利於其職務之便私底下仍然支持一些學者去藏書樓查資

料。上海著名的科學技術史專家和古文獻學家胡道靜在回憶上海通誌館的創建經過時，曾談到——

當時上海收藏各種中外文報紙最多的是徐家匯耶穌會修士院裡的天主堂藏書樓。這所藏書樓在解放後歸上海圖書館管了，但當時它是耶穌會修士院的圖書館，平時祇有在修士院裡做學問的修士、司鐸才能進去，對外根本不開放。由於我知道那裡有許多有關上海地方史的藏書、報紙，於是我就想方設法去找天主教方面的關係，結果終於找到了。原來，館長是位天主教的司鐸，是中國人，姓徐名宗澤，教名 Joseph，並根據教名的法文讀音取了個字，叫若瑟，是明朝大科學家徐光啟的後代。因為我事先知道他是徐光啟的後代，當時正在重編他祖先的集子《徐文定公集》，而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對徐光啟的科學名著《農政全書》用過一點功夫，於是一開始就與他談徐光啟的書，他很是高興，一下子就變得投機了。我說，我曉得藏書樓裡有許多有關徐光啟的書，想進去看看。他說可以，但下不為例。我想，能進去一次摸摸情況總比關在牆門外好，於是就去了。在那裡，我一下子看到許多上海的誌書。當時，通誌館收藏的上海誌書祇有《同治上海縣誌》和《上海縣續誌》，而這裡不僅有清代康熙年間的縣誌，清代嘉慶朝的縣誌，而且甚至還有明代萬曆時的縣誌。那麼舊報紙放在哪裡呢？突然，我看到擺放地方誌的對角書架下堆着許多報紙。於是，我就對他講，我對上海出版的報紙也很有興趣，想來看看，特別是天主教辦的報紙。這樣一說果然有效，他高興地同意了。於是，我從此就成了這家修士院圖書館的特殊讀者。當時，修士院外面不遠的地方有裁縫店，裡面長年有幾個裁縫在做衣裳。去修士院必須經過店旁的一扇門。平時，那扇門關着，祇有當修士院裡的人來了，店裡的裁縫才會撥動機關把門打開。至於其他人，他再招呼，他們也不會睬你。由於我與徐宗澤的關係搞好了，徐宗澤就吩咐看門的裁縫，如果我去的話，可以放入。於是我每天都可以進去了。當時，修士

院裡的修士可以把書借回去看，而我祇能坐在地上看。後來日子長了，修士就借給我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我總算可以坐着看書了。回首當時，生活真是已變得神秘不堪。就這樣，我斷斷續續約去了一年，主要是摘抄有關報紙的史料。後來，我與徐宗澤講明我是通誌館的人。⁽³⁰⁾

這是一段簡短的回憶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徐宗澤對於當時中國文化事業的積極支持。

徐宗澤在擔任藏書樓館長期間積極收集方誌，《聖教雜誌》上刊登過〈收買誌書通啟〉：

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誌書，已得千數百部，惟所缺尚多，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省，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誌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日及書價，開單見示，所缺誌書單目，請檢閱上年本誌第三期。（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啟）⁽³¹⁾

關於民國方誌的收集工作，其實在辛亥革命後就有一些學者開始注重方誌在保存地方資料上的重要性及其教育功能。1929年12月，國民政府內政部頒佈了〈修誌事例概要〉，要求“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誌館”，“即由該館編擬誌書凡例及分類綱目”上報內政部。由於政府的督促，全國各省普遍建立了修誌局、館，着手編修通誌。⁽³²⁾有了政府政策的支持，一向注重傳統文化資料收集的耶穌會也積極收集地方誌。

徐宗澤對於收集地方誌的重要性，曾經作過這樣的分析——

傳教於一地，當知一地的民風物產，政事教化，以及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居斯土而不知斯土的歷史地理，是君子之所恥。⁽³³⁾

他認為傳教士如果能瞭解地方上的風俗人情，那麼就會既可以與上層的紳商討論地方掌故，也可

以與下層的農民談耕種、鄉村的物產等，這樣可以拉近與地方人士間的關係，有利於傳教；而且地方誌中都開闢有宗教一欄，教士們應該注意收集整理教會資料，便於天主教的史事編入誌書，“許多教會的事，一經載入縣誌，非特為將來，有歷史的考據，為教會，有公文的保障。”⁽³⁴⁾當然徐宗澤在注意到參與地方誌的編撰與整理有利於傳教之一目的的同時，也再次強調了公教會一向注重文化研究這一特色，“天主教是文化的宣傳者；文化的使命，是傳教士人人負之；文化的種類，當依時地之所需要而選擇為之。我國的誌書，是我國歷史上的特殊書籍，有其特殊的價值，有研究的必要；而這研究的工作，又在傳教士的手中，人人可以為之。”⁽³⁵⁾

如今，幾經翻修的徐家匯藏書樓已經不是昔日的模樣，但走進藏書樓內部我們仍能透過保存閣樓書架領略其古樸、典雅的風韻，那些早已泛黃的中外典籍閃耀着先人的智慧和收藏者不懈的追求。

小 結

以上分析了徐宗澤作為歷史學家的四個比較突出的貢獻，即編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明清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收集整理徐光啟資料，擔任徐家匯藏書樓期間所開展的工作。其實，徐宗澤對中國天主教歷史的研究，不僅僅表現在這四個方面，他在《聖教雜誌》上還發表了很多有關教會歷史的長論。⁽³⁶⁾總體而言，徐宗澤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堅持的是一種教會歷史觀，對於很多歷史的敘述評價都是站在教會立場來進行的，這是徐宗澤著史的一大特點；希望通過弘揚明清耶穌會士們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來讓更多的人瞭解天主教，欣賞天主教，進而信仰天主教，也是徐宗澤著史的目的所在。但是瑕不掩玉，徐宗澤憑藉紮實的學術功底所做的大量中國天主教史資料的整理工作，在近代也是很少見的，它們給現代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

【註】

- (1) 王治心撰，徐以驊導讀：《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頁11。
- (2) “1913年，英斂之在北京宜靜園創立‘輔仁社’，招收教中子弟研究國學，時馬相伯、陳垣多與聚首，所擬習題有‘太古同源考’、‘元也里可溫考’、‘清四庫總目評論教中先賢著述辨’等，開天主教在華史研究之先聲。1925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允許建立輔仁大學以後，天主教傳華史在陳垣、張星垠、馮承均、向達、方豪、徐宗澤、羅光等教中及學界前輩的宣導下，有了長足的進展。”顧衛民：〈五十年來中國大陸有關基督教傳華歷史的研究〉，《當代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
- (3)(4)(5)(6)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出版，1990年版，頁16；頁109；頁277；頁279。
- (7)《圖書季刊》1939年9月，頁305。
- (8)(9)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1990年版，頁328；頁232。
- (10) 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13-236。
- (1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1988年，頁323。
- (12) 法籍耶穌會士神父費賴之的《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95；梅乖騏譯，上海光啟社，1997），是費賴之在江南傳教二十餘年，傾一生心血所作而成，研述了1773年前在華傳教的四百餘位耶穌會士的傳記和書目，廣泛引用了西文史料，隨後有榮振華神父（亦近代入華耶穌士）編了《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耿昇譯，中華書局，1995）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補充。引自陳開華：〈二十世紀漢語界的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綜述〉，《中國天主教》，2004年3月。
- (13) 李天綱：〈簡論明清“西學”中的神學和哲學〉，《復旦學報》1999年3月。
- (14)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323，轉引自榮新江：〈梵蒂岡所藏漢籍目錄兩種簡介〉，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西初識》，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3月。
- (15)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陽人，大學畢業後從事圖書館工作，先後赴法德英等國家圖書館，1936年又赴意大利羅馬梵蒂岡圖書館搜集有關天主教資料。
- (16) 向達（1900-1966），字覺明，署名方向，湖南溆浦人。1935年赴英國，初在牛津大學圖書館任交換館員，後在大不列顛博物館研究敦煌卷子和平天國文書。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館、圖書館對流出國外之我國珍貴史料進行抄錄和照相。
- (17) 陳開華：〈二十世紀漢語界的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綜述〉，《中國天主教》，2004年3月。
- (18) 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諡文定，是明末天主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個上海天主教徒。萬曆三十二年中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在北京，他向利瑪竇等學習歐洲近代科學，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又編譯《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用以改善水利、屯田以及軍器製造等。萬曆三十五年父喪扶柩回鄉守制，邀郭居靜來上海傳教，次年郭到上海開教。萬曆三十七年，在徐光啟的影響下，上海已有新教徒二百人。當時朝廷內一些官員要求請驅逐外國傳教士，徐光啟上〈辨學章疏〉，為傳教士辯護，認為天主教教義和西學科學知識，“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還把官邸當作傳教士庇護所。他長期從事農學研究，精心收集研究各地農業經驗，著《農政全書》共10卷。曾列席天啟七年在華耶穌會召開的“嘉定會議”討論有關“天主”、“上帝”的譯名等問題。後來陞為禮部尚書，監督曆局，起用西方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推算曆法，主持編纂《崇禎曆法》，製造天文儀器。其一生主要著作有主編《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其中一百零五卷親自定稿）、《徐氏庖言》五卷等。
- (19) 方豪：《天主教人物傳記》（下），中華書局1988年版，頁323。
- (20)(21)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頁314；頁325-326。
- (22) 徐宗澤主編：《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彙編》緒言，土山灣印書館1934年4月。
- (23) 王曉朝：《基督教與帝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頁143。
- (24) 徐宗澤主編：《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彙編》緒言，土山灣印書館1934年4月。
- (25) 陳彬蘇：〈徐文定公三百週年紀念〉，《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彙編》，土山灣印書館1934年4月。
- (26) 李書華：〈徐光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日感言〉，《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彙編》，土山灣印書館1934年4月。
- (27) 徐宗澤：《聖教雜誌》1937年編者語。
- (28) 顧衛民：〈天主教東傳與上海徐家匯地區〉，澳門《文化雜誌》2002年夏季刊。
- (29) 李天綱：〈徐家匯藏書樓與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頁529。
- (30) 胡道靜口述，袁燮銘整理註釋：〈關於上海通志館的回憶〉，《史林》2001年4月。
- (31) 徐宗澤：〈收買志書通啟〉，《聖教雜誌》1933年1月。
- (32) 胡道靜口述，袁燮銘整理註釋：〈關於上海通志館的回憶〉，《史林》2001年4月。
- (33)(34)(35) 徐宗澤：〈公教士當怎樣注意中國地方誌〉，《聖教雜誌》1933年8月。
- (36) 如《中國傳教得力於學術之歷史觀》（1936年1月）、《太平天國之宗教》（1936年5月）、《明清之際中國整個學術思想之革新》（1937年第10期，第1938年第4期、第5期）、《中國文化西漸之介紹者》（1938年第7期）。